

试析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中产阶级对教育改革的贡献

——以伦敦教育委员会(1870—1904)为例

李 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083)

摘 要: 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景象与突出的社会矛盾让当时的社会改革此起彼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文选举当时教育改革中重要的领导力量——伦敦教育委员会,从教育委员会委员的中产阶级身份、改革理念、选举制度和女性委员参选的意义以及中产阶级的志愿服务精神等几方面简要分析中产阶级对这场改革的贡献。这不仅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维多利亚时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还有助于为我们理清、理解中产阶级的思路和线索。

关键词: 英国中产阶级;伦敦教育委员会;教育改革

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改革是19世纪英国社会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与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是密切相关的。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到这时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但同时,很多社会内部的问题和矛盾也随之浮上水面。其中,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国民教育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摆在了英国政府面前,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教什么?怎么教?教多少?在这方面,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可谈。传统的英国经济发展与国民教育关联甚微,更多依赖个人与团体的实践行为以及传统的技术教育。工业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并不是靠着教育推动国民素质的发展而成功展开的。这种特殊性使得它有别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忽视了基础教育的建设。19世纪中后期英国发展趋缓,和欧洲大陆与美国的发展出现差距,教育问题才逐渐得到应有的重视,成为了政府社会政策的重心之一。

虽然当时的英国政府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民教育系统还没有十分明确的概念,但是在安全的保守途径与冒险的改革尝试中,以保守与妥协见长的他们却大胆地选择了后者,推出了一系列大刀阔

斧的改革措施。这不仅让英国初等教育及时地跟上了时代的发展,还与其他同期的社会改革交相辉映,彼此相辅相成。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政府能够在社会改革领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不单单是政府决策和运作的胜利,中产阶级作为重要的参与力量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贡献,这在教育改革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的影响已经在很多方面得到证实,但是直到1870年教育法提出要建立地方性的教育委员会这样一种机构之前,都从没有出现过一个一以贯之、可以完全代表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组织。教育委员会不仅帮助政府处理了如何在教育问题上更加切合地方实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把中产阶级这样一种模棱两可、虚幻模糊的概念切切实实地表现了出来。伦敦教育委员会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完全由中产阶级委员构成、推行中产阶级教育理念、奉守中产阶级行为模式、谨遵中产阶级价值判断行事的地方组织。

一、教育委员会的中产阶级性质

作者简介:李阳,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2013年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

伦敦教育委员会是一次中产阶级教育改革的实践,虽然社会民主联盟的主席亨利·亨德曼把伦敦教育委员会称为“软弱无力的中产阶级组织”,^①认为这不过是一群社会改革家把自己凑在一起参加选举罢了。但事实证明,这个组织虽然是中产阶级性质,却绝不“软弱无力”。

首先,这体现在它的成员身份上,几乎所有的任职委员都来自中产阶级背景,甚至所有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几乎都是如此,其中不乏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和社会精英。以1876年伦敦教育委员会威斯敏斯特学区的选举为例,共有9位候选人参选。选举海报上记录了他们的职业,分别有葡萄酒和烈酒商詹姆斯·巴塞特、绅士西德尼·查尔斯·巴克斯顿、^②钟表制造商乔治·戴耶、陆军中校道森·科米琉斯·格林、治安官查尔斯·唐纳生·哈德逊、《蜂巢》主编乔治·波特、兼任治安官和代理中尉的亨利·丹比·西默、金匠爱德华·詹姆斯·沃特斯顿及家具商威廉·维尔。到1879年,除了巴塞特、巴克斯顿、波特和维尔之外,又增加了8位候选人,分别是牧师布莱默·贝尔彻、律师道格拉斯·威廉·福莱士菲尔德、绅士阿尔弗莱德·坦普顿·霍金斯、绅士詹姆斯·罗斯、威斯敏斯特三一学院的院长詹姆斯·里格、未婚女士伊迪丝·西姆考克斯、下院议员威廉·俄尔维克和约翰·约克。三年之后的1882年,还增加了科学课老师和编辑爱德华·阿槐林、台球桌生产商詹姆斯·巴罗斯和私人顾问亚瑟·霍布豪斯爵士。

从中可以发现,竞选的候选人无一例外都来自中上层阶级,这也使得他们有充足的生活保障和闲余时间来处理伦敦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事项。尽管本文无法通过细致的个案调查来追踪他们每个人的竞选动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伦敦教育委员会与初等教育的改革工作对中产阶级投身社会事务的吸引力。

其次,伦敦教育委员会的改革理念也体现出中产阶级性质,代表了中产阶级追求自由与民主的精神。一方面,1870年教育法在宗教问题上的妥协几乎

完全违背了国教徒顽固的宗教理想,而采取更加温和和周全、宗教色彩较弱的非国教徒教育方式,是一次对中产阶级宗教理念的迎合。所有新建的教育委员会小学都不在教义说明上做具体、明确的解释,单单只是阅读《圣经》,平息了很多中产阶级非国教徒的担忧。另一方面,教育委员会推广的教育理念不仅重视基本的素质教育,还注重个人技能培训。工业化发展要求知识与技术兼备、素质全面的现代化人才,这与中产阶级的追求正好不谋而合。中产阶级所推行的教育理念,不仅包括对个人基本素质的教育,还包括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条件的技能培训,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比前者更加重要。另外,在保证基础教育实现的基础上,他们也对他人的文化、品位等精神追求提出了要求,鼓励学生发展兴趣爱好,积极从事体育运动、戏剧表演、歌唱等活动。这些都有别于英国传统社会的教育思想,更加区别于贵族所奉行的以古典、人文主义与宗教教育为核心的精英教育,体现了中产阶级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不同教育观与价值观。在伦敦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来看,他们要培养工业社会合格的人才,就不只要让他学习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还要让他成为一个知情达义、素质全面的现代人。

此外,普选制也让人感受到中产阶级参与教育改革的热情。1870年11月30日举行的伦敦教育委员会第一次选举几乎成为当时的一大盛事,不仅在于教育委员会是国家正式介入教育的第一次实践,在地方还是个新鲜事,而且还在于它实行了普选制。根据统计,伦敦有权参加教育委员会选举的人数多达数十万人,累计选票数目可达上百万张。^③除了儿童和已婚妇女,^④几乎所有的伦敦人都有权为自己心仪的教育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投票。选举海报呼吁选民重视自己的权利和资格,鼓励他们参加投票。《泰晤士报》在选举当天赞叹说:“不管欧洲大陆发生了什么,今天英国的头等大事都是第一届伦敦教育委员会的选举。除了议会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像这么强大了,如果这种力量是根据它对人民大众

^①Jane Martin, "Working for the people? Mrs Bridges Adams and the London School Board, 1897-1904",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29(Jan., 2000), pp.49-62.

^②英国传统社会把“绅士”看作一种职业,指那些不参加任何工作、不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取任何收入的上层人士,他们的收入多来自遗产、地租、商业投资等等。

^③1882年,伦敦有权参加教育委员会选举的选民人数为594,000人,累计票数三百多万张,被称为“全世界有选举权力的最大选区”。(SBL 1446, *Miscellaneous working papers, posters etc for Westminster Division in boxes. 1876 - 1894.*)

^④伦敦教育委员会的选举章程认为,已婚妇女不应该有投票权。(SBL 1454, *Miscellaneous working papers, posters etc for Westminster Division in boxes. 1876 - 1894.*)

所产生的影响力来判断的话。”^①

除了选民,强大的候选阵容也引人瞩目。大约有135名候选人最终参与到这场选举盛事中,其中不乏志在改变英国教育环境、改善其教育质量的有志之士。《季刊》称“这些参加选举的候选人都是人中的尖子”,是“选民们想要选出的那些把教育放在首位、把经济放在次位的人”。^②《泰晤士报》更是提醒广大选民,“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候选人:他要有能力理解摆在他面前的困难,要有独立的思想,不会先入为主地执行法案的精神,同时,他还要有带动他的选民的影响力”。^③

二、中产阶级女性参选的意义

过去,由于生理、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女性都被拒绝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更是与政治绝缘,但是这次,地方教育委员会的选举却向她们发出了邀请,实属难得。尽管这并不能代表社会已经开始广泛接纳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的女性,毕竟当时在政治、经济等其他公共事务上严重失衡的性别比例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④但是1870年初等教育法仍然为女性参选准备了条件。它接纳女性参加教育委员会的选举。她们既可以作为候选人成为委员,也可以作为选民为心仪的候选人投票。之前已经开始活跃在大众视野中的呼吁女性获得选举权的组织和机构是最早对这一决定作出反应的。包括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布里斯托尔在内的很多城市都积极支持女性参选,并获得了成功。第一年选举中最终有4位女性成功当选,包括来自伦敦的伊丽莎白·加瑞特和艾米莉·戴维斯。^⑤她们都获得了各自选区的最高票数。伊丽莎白更是得到了伦敦教育委员会第一年选举中候选人所获得的最高票数——玛丽勒伯恩区的47,858票。

作为英国新女性代表的佼佼者,伊丽莎白是英国第一位获得药剂师协会颁发从业资格证的女性和第一位英国医学院的女院长,同时她还是英国第一位女性市长。艾米莉则是活跃在教育改革领域的著名女性教育家,在很多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并且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所以,伦敦教育委员会的女性选举绝非仅仅是为了把社会的另外半边天招入麾下。它接纳的是后者中的精英。有学者指出,这些教育委员会女性成员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她们都来自一个热衷政治的家庭、有中产阶级背景、热衷教育事业。^⑥因此,如果我们把她们看作是简单的女权主义者或者是女性解放运动的领头人,把教育委员会此举看作是为女权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女性参选让教育委员会也有别于传统的男性主导的社会机构和政府组织,为它增添了一丝“女人味儿”,增加了它的民众亲和力。“这种想象中的母亲或姊妹般的感情和民主参与与市民身份的象征一起,格外有说服力”。^⑦这也在英国选举的历史上树立了一座袖珍小巧的里程碑,让当时的媒体找到了第一届选举中颇有份量的卖点。他们挥毫泼墨,大力宣扬这些“候选女士”们,就像今天的政治作秀一样,把她们的长相、穿着、声音和谈吐都拿出来尽情报道一番。毕竟“公共舞台上的女性”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对他们而言,女性参加选举这件事情的娱乐价值,一点也不亚于其进步意义,甚至还要强过后者。

正如大部分教育委员会成员一样,几乎所有的女性成员也都属于中上层阶级。除了热衷教育事业、政治活动活跃之外,她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倾向于策划并支持激进的政策。在20多位女性成员中,仅有3位被看作是温和派。^⑧如此高比例的激进倾向在同时期的教育委员会男性成员中都不多见,似乎

① Hugh B. Philpott, *London at School*,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4, p.18.

② Stuart Maclure,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London 1870-1990*, London: Allen Lane, 1990, p.18.

③ Thomas Alfred Spalding, *The Work of the London School Board*, London: P.S.King & Son, 1900, p.28.

④除了两位杰出的女性代表外,在伦敦教育委员会第一年选出的49名委员当中,其他全是男性。他们中有很多人甚至不屑于把女性当作自己的同事或战友。在他们看来,这些女人的加入仅仅是为了让这个跟儿童教育有关的机构更添几分温情罢了。

⑤还有来自爱丁堡的芙萝拉·史蒂文森与来自曼彻斯特的莉蒂亚·贝克。

⑥ Jane Martin,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Schooling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ngland*,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3.

⑦ Jane Martin, “Working for the people? Mrs Bridges Adams and the London School Board, 1897-1904”,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29 (Jan., 2000), pp.49-62.

⑧ Annmarie Turnbull, “So Extremely like Parliament”: the Work of the Women Members of the London School Board, 1870-1904, in *London Feminist History Group, The Sexual Dynamics of History, Men’s Power, Women’s Resistan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p.122.

表达了被禁锢的中产阶级女性在变革时期所表现出的对自身解放的渴望和被社会认可的期待。从那时起,社会就赋予她们一份使命,让她们参与到各种公共事务中去,肩负起疏通阶级关系和代言公共大众的责任,尽管这还是时常引起男性的批评和质疑。

但这些在伦敦教育委员会拥有一席之地的女性也比那些在家中操持家务、在公园里散步、在沙龙里聊天的女性承受了更多的非议和压力。即便是与她们同时效力于教育委员会的男性同僚都会常常表现出对她们的轻视和敌意。教育委员会后期的一位重要女性成员罗莎蒙德·达文波特·希尔回忆说,她习惯在每次开会的时候坐在一边安安静静地织毛衣,但这也会让她的一些男同事们很反感。当某次选举会议上有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她忍不住回应说,这还是她头一回听说一个女人因为用手太多、开口太少而被人抱怨的。^①另外一位女性委员伊迪丝也在某次发言中坦承,任何一个“女性感情充沛、拥有属于自己舒适的家的女人”,一旦她知道自己代表教育委员会工作后会面对什么情况的话,或许永远不会选择那么做。^②

不过这种对于男性主导社会模式的挑战不仅出现在委员层面,也表现在选民层面。普通的工人阶级女性和其他底层妇女却获得了难能可贵的选举权,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教育理想。1894年威斯敏斯特学区的候选人名单公示下方特别强调:“所有男性、单身女性、丧偶女性,只要有一处登记在名下的房屋、商店、公寓、办公室,或者是一间或几间房,都有权投票,无论他们向税官直接缴纳税收,或者是通过向他们房东缴纳房租的方式(纳税)。”^③

三、中产阶级的志愿服务精神

除了上述因素,我们还必须看到中产阶级的志愿服务精神具有的强大推动力。虽然不能考量志愿行为在其中扮演了如何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没有委员们自我奉献、勇于冒险的牺牲精神和积极合作的态度,教育委员会不可能在成立初期就打下一个

坚实良好的基础,并赢得一份良好的口碑。这些都是英国历史上传统的慈善行为与中产阶级出现后推动的志愿机构相辅相成所产生的,是对不力的王权管理与宗教控制力量的补充。宗教信仰指导人们向善,但不能保证人人衣食无忧;同理,国王与政府确保了社会秩序的稳固,却不能保证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生活富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发现可以依靠彼此间联合的努力建立一个志愿的系统,来帮助因为疾病、年老、伤残和经济形势的变化或者其他原因而导致的贫困人群。

早期的志愿组织包括了各种专业性较强、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大部分都与慈善机构紧密相关。中产阶级出现后,他们对理性、道德和自我指引的重视促使他们更加强调这种符合宗教慈善精神的行为。部分出于效仿贵族阶层、部分自身萌发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投身于传播知识、促进地方福利和推动公共事业的地方协会,目的就在于救济贫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力求在他们个体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对国家所能提供的“最低限度的帮助”(济贫法)给予一点补偿和支援:“人们认为,如果高于这一限度,则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基本品质。所谓的良好社会,指的是那些拥有财富、时间或其他社会资源的人,应该自愿帮助没有特权的人。”^④

到19世纪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各个志愿组织之间展开了更加广泛、紧密的合作。^⑤中产阶级在其中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让这种志愿服务成为表达中产阶级社会责任的一个特征,并且渗透在了他们所提倡的中产阶级美德当中。志愿协会的涌现反映了中产阶级成长的不争事实,体现了中产阶级成长的公民意识与阶级认同,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所拥有的强大实力。志愿行为的这种成功价值为政府介入社会领域的改革探路作指引,使得后者的政策能够更加符合现实并更有效率。这一点在教育制度方面得到了如此深刻的体现,并为其他领域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伦敦教育委员会各位委员对工作投入的热情和兴趣使得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充满了人情味,广博赞誉。这种有别于其他政府机

①② Annmarie Turnbull, "So Extremely like Parliament": the Work of the Women Members of the London School Board, 1870-1904 in London Feminist History Group, *The Sexual Dynamics of History, Men's Power, Women's Resistan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p.128, p.128.

③ SBL 1454, *Miscellaneous working papers, posters etc for Westminster Division in boxes. 1876 - 1894.*

④ 钱乘旦,高岱主编:《英国史新探:全球视野与文化转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2页。

⑤ 由个人的志愿行为发展到有组织的支援协会经过了一个阶段。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暴露出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之后,人们单独、零散的支援服务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有能力的个人逐渐联合起来,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志愿组织。

机构的特征避免了其他官僚主义色彩更浓的机构可能导致的极权倾向。这些自愿参加教育委员会工作的男士女士们为了儿童教育权益而奔波劳碌的精神,为这份工作灌注了蓬勃的生命力,大大提高了工作成功的可能。因此,“在19世纪的历史中,如果有可能的话,英国政府都会把新的社会立法的执行工作移交给地方权威以及志愿组织”。^①

工作、消费、居所、正式或非正式的志愿行为、家庭组织和机构都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一切都证实了中产阶级自我认同并为此奋斗的阶级意识,通过一系列被精确定义的自我控制的方式,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竞技场上展示着他们的特征,并且不断地繁衍再生。家庭和宗教为他们搭建了经济资本流通的网络;孩童时期的社交和之后的教育是他们投资文化资本的途径;高度规范的社会活动则为他们保存符号资本提供了平台。这是一个经年累月建立起的成熟系统,此时的中上层中产阶级几乎已经能在其中运作得如行云流水一般自如。^②中产阶级的政治观从来都没有被统一,它一直都是以个人主义和自我价值为中心的,因此相对对抗,它更倾向于妥协与和解。

这种“渐进的”前进步伐深刻地体现在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改革之中,几乎成为了英国人的一种气质。当我们谈论英国发生的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我们更多地就会想起这种亦步亦趋、和缓向前的状态。这与它采用较为保守的妥协原则分不开,却又建立在一种冒险与探索的精神基础之上。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些英国人形容为“不打无把握的仗”,这样,尽管他们不能预知最后的结果,但是他们总是把局面控制在自己可以掌握的范围内,因此尽可能地避免了失控的情况发生。任何一个机构、部门、团体甚至是个人都是这台庞大精密仪器上的关节点,在它逐渐发生变革、迈向进步的同时,也发挥着自身的作用,把周围的力量集合起来,推动前进的脚步。正是这一个小小的伦敦教育委员会,却集中体现了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行为等种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反映了当时英国宗教势力、教育组织、福利机构发展和变化的态势。政府部门借着这块阵地实践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普选、社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过

程;社会团体则借着教育阵营的扩大开展自己更加广泛的活动,为福利机构的实现提供了便利条件;宗教势力试图借助与教育的特殊关系来维护自己的领土,在世俗化的趋势下保存宗教信仰对社会生活的力量……失去其中任何一种力量,整体的和谐就会失衡。

中产阶级在当时站出来成立一个这样的社会组织来实践改革思想也是必然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必须要有一条线把它们和谐地串连在一起。从社会结构上来讲,中产阶级与贵族特权阶级和下层阶级都会发生联系;从经济结构来讲,中产阶级的职业范围也几乎包括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决定了它不仅代表不属于它的很多人,同时还能对这些人的处境感同身受,也就比任何其他一个阶级要更具有包容性和妥协精神。

四、结语

19世纪是英国政府在社会改革措施方面颇有建树的时期。教育改革的微妙之处在于它是对未来的改变,是当前这代人所表达的他们对未来的愿景。德克海姆把教育定义为“成年人对那些还没准备好开始社会生活的一代人所施加的影响力,目的是为了在孩童时代就培养起他们全方位的身体、智力和道德素质,这不仅是整体整治社会的需要,也是每个人特殊的出生环境对他的要求”。^③就像机器生产带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一样,政府在社会改革方面的积极行动和不断产生的新想法也引发了所谓的“政府革命”。一方面,这些新想法的产生和实践都需要有人来配合;但是另外一方面,传统的英国统治阶层在这方面则表现出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中产阶级就是把这种想法带入实践的践行者。本文想强调的,正是中产阶级在这种背景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的英国社会几乎在各方面都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虽然底层人民的悲惨和贫困饱受诟病,但这仍然不能妨碍它从社会的每个缝隙和角落里迸发出变革的火花来。中产阶级掀起的民主改革热潮方

(下转第9页)

①Pat Than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750-1914",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vol.3, pp.1-63.

②Linda Young, *Middle Class Culture in 19th century America, Australia, and Britai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Limited, 2003, p.31.

③Gillian Sutherland, *Policy-making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1870-189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

在广阔的东亚海域存在着世人瞩目的“中华经济网络”。这个“网络”的前身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现在,无论其规模与功能,都已超越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中华经济网络”的形成,得力于历代华人移民向南洋扩散。扩散不是“离散”,结果“散”而不“离”,组成连接中国的宏大海域“网络”。长期的历史延续过程中,中国南方居民“不得已的移民活动”,所造成的对现代中国的“正面的社会效应,始料所不及”。^①

滨下认为香港是“中华经济网络”上的一个典型“网络枢纽”,有两个作用:其一,华人的移民中转站。经由此“站”,中国人不仅移民南洋,还前往美国、加拿大、澳洲等世界各地。其二,华侨向中国汇款的金融转运站。这两个作用,不仅把华人移民途径与资金流动线索连接起来,还将亚洲临近地区吸引组合起来,形成以香港为“枢纽”的经济区域。

由上可见,滨下武志的亚洲理论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他的理论不属于新亚洲主义,也不属于太平洋亚洲论,因此更具公允平实的特征。其次,如果说新亚洲主义与太平洋亚洲论都有前人的理论工具可以沿用,那么滨下的理论工具则是自制与独创的。他创造“海域史观”,超越既有的“地域史观”,从海洋的视角观察历史,探寻规律,所得的亚洲认识

更具新意。再有,滨下在研究亚洲时,特别注重中国史的考察。他从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圈及当代中华经济网络研究所得的成果,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具有直接有益的参考价值。

滨下武志的亚洲理论还具有许多特点,如陈威志、石之瑜所言:一、发现亚洲内部的历史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二、从体现历史纽带的亚洲内部的“国际秩序”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变化中,把握“作为亚洲史的延续性”的亚洲近现代;三、改变过往从“时间顺序”探讨历史的方法,转为从“空间模式”的角度观察历史。由此建立多元的历史新模式。^②

综上所述,日本进入21世纪之际,进行了一场有关“亚洲是什么”的大讨论,目的在于从日本的立场,重新定位亚洲的“身份”,进而回答如何看日本,也包括看中国。三个最有影响的思潮派别发出声音,它们各从新亚洲主义、太平洋亚洲论、海域史观立场阐述自己的亚洲观。对此加以回顾与探讨,将对中国如何设计亚洲战略,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如何在变动的国际环境中坚持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也提示我们必须进一步警惕日本右翼复活,并给予更深入的批判。

^①滨下武志编著:《東アジア世界の地域ネットワーク》,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陈威志、石之瑜:《从亚洲认识中国:滨下武志研究“朝贡体系”的启示》,《政治科学论丛》2009年3月。

(上接第66页)

兴未艾,工人阶级就紧随其后要求同等的选举权利;激进派煽动着人民批判政府的无能,保守派竭尽可能修修补补,迎合人民的呼声;各种社会力量都在动员自己的成员,经济增长的客观现实也刺激着人们对于新事物的渴望……所以教育在此时的觉醒是必然的,是现代化社会对其内部成员要求的大势所趋。它既是改革浪潮中人们渴望拿来武装自己的武器,也顺应了社会变化的形势,是其蔓延扩散的洪流中

的分支。恰巧是这股变革的春风拉开了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的序幕,中产阶级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建的教育委员会就是一块试验田。在教育委员会的谢幕典礼上,雷伊勋爵格外强调教育委员会“试验性”的特点:“英国政治制度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地方机关是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前提下出现的,并且只运作一段短暂的时间。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指引,教育委员会却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了它的目标,它的经验会很有价值。”^①

^①Valedictory Addres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Lord Reay.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School Board for London*, London: P.S.King & Son, 1904.